

主持人语

1788年，英国在澳洲建立殖民地，是年也成为澳大利亚建国年。由于英国殖民者将澳洲视为帝国的前哨，将其打造成一个白人移民国家就成为英国的政治或战略目标。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白澳政策”在澳洲大行其道，该政策的实施虽不能完全杜绝亚洲有色人种的移入和繁衍，但在澳的有色人种不仅数量极其有限，且无法享有公民权，处处受到歧视和压制。“白澳政策”不仅影响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也对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形成起到了法律护佑与政策工具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白澳政策”虽被迫废除，但时至今日其流毒仍难净除，继续影响着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

有人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被错放位置的国家，它本应是欧洲国家，但现在不得不与亚洲为邻。错放位置本没什么，但对于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澳大利亚来说，其北部是人口众多、宗教信仰多样、发展相对落后的亚洲，这让澳洲白人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油然而生。种族的优越感、地理位置的孤僻感以及长期依赖于大国的保护，使得澳大利亚不愿也不屑于与亚洲国家平等交往，对亚洲充满偏见、歧视和对抗意识。

19世纪中叶，澳大利亚政界就已在谈论对亚洲的看法；联邦成立前后，相关争论日趋激烈。学术界围绕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种族安全、领土安全、财富安全等）和国家属性（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的讨论持续不断且形成了不同流派。无论是涉及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属性，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将

亚洲视为背景、参照物以及立论的依据。相关研究观点不仅对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影响了政府的亚洲政策。

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四十多年来，得益于国内良好的学术环境及中澳关系的持续发展，从事澳研的人数日益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历史渊源与现实悖论”既蕴含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一整天的发言与讨论中，与会学者就上述主题展开深入细致的交流，对于学界以及公众进一步认识澳大利亚的亚洲观，进而管窥澳大利亚的外交与防务战略的决策背景、机制及其动机都具有积极意义。

汪诗明

2019年5月15日

“博雅工作坊”第18工作间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历史渊源与现实悖论

2019年5月13日

本期博雅德信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汪诗明教授发起，邀请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国内高校院所的14名专家学者进行对话交流。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表示，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国内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随着中国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并向舞台中心靠拢，区域与国别研究已在国家层面提上了日程，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在国内没有受到重视，并不是说国内学术界缺少做外国问题的研究学者，只是受制于国内学科的分类，整体性研究被分割成条条块块。2018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目的就是希望将分散在北大校内各个学科对外国问题研究的力量整合起来，在现有师资力量、学术力量、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平台作用，将区域与国别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全方位而非局限于某个领域的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本理念，因此应该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以来，已与校内包括理工科在内的多个学科院系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

系。今年 9 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正式开始进行博士研究生培养，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学习，培养出一批真正称得上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术人才，他们既有进行研究的能力，也有参与实际工作的才能。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胡壮麟首先发言，题目是《美中澳三角关系中的澳大利亚》。

他表示，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澳大利亚在大多数情况下紧跟美国，但在一些事件上与美国也存在分歧。比如，1972 年美国在越南进行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澳大利亚对此提出意见，但并未得到美国的回应；在美国攻打伊拉克后，澳大利亚对此持保留意见，被认为是美国的“不合格支持者”；此外，在东帝汶维和、对印度出口硫矿石等事件上，澳美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在经济领域，澳大利亚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想的贸易伙伴，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其愿与中国在包括 APEC 框架等多个经贸领域开展合作。但另一方面，因为在制度、思想上与中国不同，澳大利亚对中国又心存疑虑。

在中美澳三国关系中，澳大利亚基本采取既跟着美国走，又与中国保持贸易伙伴关系的策略。澳大利亚认为，美国对澳采取“又让又打”的策略，既表现出美澳是最亲密的朋友，又对澳施压，推动澳提高军费，以减轻美国负担。而对中国采取的是“又打又让”的策略，在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同时，声称美中两国同为大国，应该具有更为亲密的关系。因此在澳大利亚眼中，美国对它和中国没什么不同。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澳大利亚认为这种状态对中美澳三

方都是不利的，同时它提出，美国放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这给跟着美国的“伙伴”带来了损失。在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问题上，澳大利亚虽遭到了美国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加入了该合作框架。可以看出，对于美中澳关系，澳大利亚既确认美国和中国的权利，又不希望自己扮演加快中美关系紧张的角色，但同时也在推动自由贸易亚洲的形成。

美国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视澳大利亚，它希望其能在亚洲各领域代表美国的利益进行活动，澳大利亚领导层也希望能扮演这个角色，在亚太地区起领导作用。但实际上这一目标很难达成，因为亚太地区太大，无论是与中国、日本还是印度相比，澳大利亚都很难成为地区领袖。为此，澳大利亚改变策略，将东盟国家组织起来，希望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这一策略同样遭到了外界及其内部的质疑。

总的来看，目前澳大利亚内部对于如何处理中美澳三国关系有不同意见，受其内部政治博弈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的战略受到质疑，维持两边“拉关系”的政策仍将是其首要选择。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师小芹的发言主题是《战争与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她认为，战争是澳大利亚自我身份建构的核心途径。从帝国前哨到维和行动，再到对未来美中竞争的展望，澳大利亚通过战争与亚洲建立起深度联系，也在战争中塑造着自己的亚洲观念。

战争是塑造国家身份重要的途径，澳大利亚是通过一次的参加战争从而塑造了“他是谁”，之后由“他是谁”塑造出“亚洲对他的意义”、“世界对他的意义”以及澳大利亚

自己的定位。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二战之前，澳大利亚的身份是“帝国前沿”。一方面，澳大利亚是英帝国的前沿据点，关键时刻将扮演“前锋”角色，但同时孤立的现实也会使其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受多重条件限制，二战之前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接触非常有限。19世纪末，太平洋许多岛屿被列强占领，感受到威胁的澳大利亚希望在亚洲建立一定范围的缓冲区，从心理上获得安全感。20世纪初至一战结束，澳大利亚逐渐接管了北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北所罗门群岛，以及对瑙鲁的行政权。二战爆发后，澳大利亚认为英国难以保护其安全，因此转向依靠美国，之后澳军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南太平洋作战，对亚洲的了解逐渐增多。

二战之后，澳大利亚的身份是“双重前沿”。一方面，澳大利亚仍是帝国前沿，特别是在二战后美国的全球秩序中，与美国结盟的澳大利亚具有西方帝国“子民”的身份。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亚洲意识不断觉醒，跟亚洲的关系更为紧密，单一身份向双重身份转换，帝国感渐渐下降，地区感不断上升。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在提到亚洲时会用“我们的区域”进行表述。朝鲜战争时，澳大利亚开始使用“在亚洲”的表述，表明其在亚洲但不是亚洲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至今，澳大利亚的身份从帝国前沿转变为前沿防御。1972年澳大利亚首份国防白皮书提出，要做出精干高效的全球性承诺，维持与强大盟友的友谊，对其近邻地区（immediate neighborhood）有所贡献。在国防方面，澳大利亚提出自主国防政策，即减少对外军事卷入，减少对美

国依赖，仅在本土受到常规威胁时自卫；在近邻地区发挥大国作用，与“北方”朋友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此时澳大利亚已经将自身放在亚洲图景中，其亚洲心理转换基本完成。导致这一阶段变化的背景是上世纪 90 年代霍克和基廷政府的“中等大国”外交政策和“地区主义”趋势的增强。

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对未来战略的讨论非常激烈，比如是否应该“选边”。澳大利亚最新的外交政策白皮书提出，中国是澳大利亚外部环境中最大、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变化因素，如何应对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新挑战。其国内战略界有人提出，应建立向北的前沿纵深防御，加大北领地建设，与印尼等国加强防务合作。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由此前的陆地意识开始转向海洋意识。尽管澳大利亚四面环海，但在历史上海洋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前往不同大陆参与国际事务的通道，转向海洋意识后，澳大利亚将从海上与亚洲进行交往，将海洋视为与亚洲联系的纽带。这种变化也将成为澳大利亚自我利益觉醒和锚定印太的标志。

师小芹指出，在中澳关系中，澳大利亚的自我认知是中等大国、夹在中美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小国、南太平洋责无旁贷的大国、富裕民主自由的旗手。这种认知经常被亚洲国家视为优越感，对亚洲历史文化存在隔膜。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心态的相互认知上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心态 VS 小国/民主国家心态。因此，当澳大利亚批评中国时，中国会表现出对富国、民主国家的对抗心态；而当中国批评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会表现出对大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心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方银的发言聚

焦中澳关系。他认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中国威胁论”呈上升趋势，但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未在安全上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从国家安全、双方经贸联系的角度很难解释澳大利亚“中国威胁论”的发展。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疑虑，主要基于对国际秩序演化不确定性的担忧，在此基础上，美国作为盟国施加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存在也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从安全角度看，中国是否对澳大利亚构成了现实威胁？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澳大利亚自己。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提到，如果中国不对其军事现代化解释清楚，将令人担忧。2013年国防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并不是针对澳大利亚，只是其经济增长带来的自然且合理的结果。2017年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指出，虽然国际形势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但澳大利亚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其面临的军事安全的威胁风险是非常低的。总体上看，尽管澳大利亚对中国军事力量增强有所担忧，但并不认为中国在安全上对其有威胁，对中国军事力量变化的理解和认知比较客观理性。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是否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威胁？贸易方面，近年来中澳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且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由于两国出口贸易的不同特性，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赖的脆弱性高于澳大利亚对中国贸易依赖的脆弱性。投资方面，尽管可能对中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远没有达到令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进一步恶化的程度。2018年民调显示，72%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中国对澳投资太多了，而2014年

时这一比例是 56%。然而，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控制中国对澳投资是其能力范围的事，没有必要因投资过高而高调反华，况且过去两年中国对澳投资已经出现连续下降，并且从经济角度看，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首先受到影响的就包括澳大利亚，因此澳方并不想因经济因素刺激中国。由此看来，投资因素只能算是一个催化剂，在中澳关系中被一些人利用。

有一小部分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旺盛需求，将导致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最后受制于中国。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一是澳大利亚对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并不担忧，因为中澳贸易依存是相互的，中国对其铁矿石、煤炭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找到替代的。二是中澳关系恶化发生在 2017 年之后，而在此之前，双方已达成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且澳大利亚也加入了亚投行，因此经济因素并不是中澳关系恶化的原因。三是尽管中澳关系恶化，但两国经贸关系仍在加强。中澳双方长期存在贸易顺差，2018 年有民调显示，8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其经济伙伴。

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冲击，是澳大利亚对华担忧的根本性因素。澳大利亚认为，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会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争夺霸权，改变现有秩序。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忧，澳大利亚 2017 年白皮书明确指出，确保印太地区的繁荣，基本国际原则不被破坏，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长远对外战略目标。但同时澳大利亚也认为，中国正在挑战二战以来美国作为印太地区支配型力量的地位，将中国定位为有能力影响澳大利亚的地

缘政治大国。某种意义上讲，澳大利亚对于南海问题的关心并不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了澳大利亚的安全，而是这一问题是否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形成冲击。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不希望看到中国主导经济秩序，它希望维护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有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认为自己可以从中受益。虽然其国内有观点认为，未来中国崛起是不可改变的，美国要与中国共同领导现有秩序，澳大利亚要适应这个现实，但该观点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较大反弹，认为澳大利亚接受中国的主导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对秩序的担忧应该是澳大利亚对华态度变化的合理解释。从另一个方面看，澳大利亚的表现也反映出其对自己政治自主性的担忧，虽然有些夸大，但澳大利亚的确认为如果谁都无法阻挡中国，未来的前景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改善中澳关系不应仅仅就事论事，而应从如何减少对体系的冲击角度寻找应对思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探讨的话题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外交的外部环境。他认为，在自然禀赋视角下，对中澳经济关系的观察极易局限在产品贸易，尤其是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领域。但在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其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谋划所诱导的“安全”因素一直都在发挥作用。近年，澳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些做法，已经开始对中国的产品链国际化形成掣肘。因此，没有理由将对中澳经济关系的审视局限在GDP和贸易量一类的数据现象中。

澳大利亚属于资源型经济，在重点矿种商品的生产中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它还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具潜力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具有四通八达的海运出口条件。澳洲人口较少，医疗和保险服务相对完善，连续 30 年没有发生过经济衰退，矿业持续 160 余年拉动其经济增长，成功避免落入“资源陷阱”。应该看到，在资源型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层面，供方是有优势的。在中澳关系中，并不会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一些矿产品的最大用户，主动权就在中方，特别是涉及到与高端制造业相关的稀有矿产，不是有钱就能买到。

从贸易角度看，中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贸易伙伴，2017 年两国双向贸易总值增长 16%，达到 1834 亿澳元，占澳总量的 24%。但是，贸易量仅仅是经济外交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况且这其中 60%都来自于中国对澳大利亚农矿产品的刚性需求。作为对比，2005 年之前日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去向国，但与中国不同，日本是维系澳大利亚铁矿石产能的矿山机械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从投资领域看，澳大利亚对中资投资的企业在所有制层面设立了审查机制，虽然相关审查委员会设立于 1976 年，且并不是针对中国设立的，但应看到 2009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感觉所谓的“中国崛起压力”较大，一个原因就是中资企业开始在外国投资。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在 2009 年针对几起中资并购案的裁定，是西方区别对待中资的开始，这其中既有山东如意集团收购 Cubbie Station 的案例，也有中铝集团增持力拓股份的案例。政策上歧视中资国企的投资成为惯例，在该领域澳大利亚对欧美起了示范的作用。

国际社会存在一种说法，即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必有战略动机，这种舆论最初也源于澳大利亚。尽管维持“不透明”指责的是媒体和学界，但政府部门却充分利用了这一舆论环境。比如山东岚桥集团投资达尔文港，被持续指责有威胁澳国家安全之嫌。如果真的为了安全，终止其投资即可，但澳方既需要中资运营港口，又对其进行指责，这就是澳大利亚“不地道”的地方。另一个案例是国家电网并购新南威尔士州 Ausgrid，被以国家安全为由中止，但实际上，该项目所涉及的整个产业链都处于澳政府的控制下，并不存在对澳大利亚社会不可控的威胁。

查道炯指出，在观察研究中澳经济关系时，仅仅从要素互补的角度出发，效用有限，因为双边贸易中产品结构单一实质上压缩了澳在政治领域妥协的空间。不能因为中国体量大，就认为澳大利亚必须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反而在一些关键性的商品和产品上，澳大利亚会在源头上钳制中国。如何有效应对澳在塑造中国经济外交的外部环境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中方需要同期参与相关事件的讨论，不能只是听对方的，另一方面要回溯、分析近几年两国经贸、投资往来中的重大事件，扩大双方相互“认理”的空间。此外，要努力推动澳资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运营，同时在教育、人文交流、领事服务方面，同等对待任何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公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刘卿的发言主要探讨了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特点及未来走向。他认为，澳对华政策回旋空间受压缩，不得不牺牲经

济利益换取安全利益。同时，澳也在中美两极之外积极寻找可替代选择，拓展与日、印、东南亚国家外交。未来澳将着重推进“印太战略”，打造以澳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辐射带，提升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中美竞争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其在中美之间两面讨好的空间受到压缩。与此前平衡注重安全和经济不同，澳大利亚现在更看重安全问题，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自然站在美国一边，对华政治收紧，导致中澳关系紧张。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收紧了美澳同盟关系。经济方面，过去三年美国对澳投资增加 50%，达 1 万多亿美元，中国在澳投资约为 1000 亿澳元，中美投资比约为 10: 1。安全方面，为了迎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澳大利亚将其对华经济、外交、人文等领域的交流都与安全挂钩，设置相关安全议题。

中美竞争影响的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反制。目前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可以说是降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去年澳大利亚新总理莫里森上台称要恢复对华关系，但没有拿出太多实际行动。中国对澳外交进入降温期，经济合作也在减退，澳大利亚面临经济利益换取安全利益的损失。

此外，由于地区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澳大利亚不得不适应地区新变化。首先是亚太秩序经历了深刻变化。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迅速上升，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转移，地区规则、秩序都有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美国打破了其建立的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这使依靠自由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受到了巨大冲击。在美国不愿提供公共产品和中国积极构建新的亚太秩序的

大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着战略困惑和战略焦虑。

建构新的印太秩序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中美竞争新的方向是向海洋延伸，印太战略就是澳大利亚协助美国重构海洋秩序以抵制陆权国家向海洋拓展的新战略。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美国加强了对第二岛链的部署，其在西太平洋的后方基地如今变成了前沿阵地，澳大利亚在美国西太平洋同盟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倚重加强，澳大利亚也需要适应美国新战略的变化。

澳大利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等强国，需要积极塑造印太战略，并将自己变为印太战略的核心，从此前的与世无争转变为地缘参与者。澳大利亚要驾驭这个崭新的战略变化，就必须面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这也加大了其塑造印太秩序的不确定性。

在亚洲政策方面，澳大利亚有三种选择。一是短期政策让位于长期政策，对华政策让位于对美政策。短期来看，在中美实力对比美国仍占优势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向美国靠拢符合国家间关系的逻辑，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要从属与美国的亚洲战略，其融入亚洲的政策（主要是与中国的接触与融合）要放缓。但从长期看，美国不确定性风险上升，不排除澳大利亚向中国方面回摆。二是在中美之外寻找新的战略合作伙伴，比如加强与日本、印度的安全合作对冲中国的影响；经济方面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寻找替代方案，实现经济多元化。三是以印太战略为中心谋取中等强国的战略地位，主动出击，包括借助美国的力量巩固南太地区的霸权，以及借助东盟的力量维护自身海洋大国的战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春梅的发言题目为《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地缘经济视角》。她认为，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及其亚洲政策受其历史文化、安全认知、地缘政治影响，更受地缘经济左右。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但地缘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决定着澳大利亚既有的亚洲政策不会出现较大偏离。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其整个经济发展史就是对外贸易史或外国投资史。在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与英美等传统经济伙伴的关系以及亚洲经济伙伴关系的此消彼长的趋势，决定了澳大利亚必须融入亚洲。另外从投资看，二战之前澳大利亚并没有外国资本的概念，更多的是海外资本，这是因为二战之前英国投资占总额的70%以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才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外资来源地。在英国主导澳大利亚经济的同期，澳大利亚面对亚洲时带有种族优越感和国土不安全感，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前，澳大利亚经济上不与亚洲打交道，安全上对亚洲处于防范的心态。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始于日本。1961年英国决定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表明澳大利亚已不再是其经济重心，澳大利亚需要寻找新的市场。美国虽然与澳大利亚有着紧密的政治和投资关系，但两国贸易的同质性很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就成为了替代性的选择。虽然二战时日本侵略过澳大利亚，但战后美日同盟、美澳新同盟的建立，变相地将澳大利亚和日本连在了一起。日本20世纪60年代进入快速工业化

阶段，其作为岛国资源匮乏，距离其较近的澳大利亚优越性凸显，同时澳大利亚也需要新的伙伴市场，日澳的互补性由此显现。及至 1966 年，日本已超过英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此后又超越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直到 2009 年这一地位才被中国超越。

从投资领域看，日本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是顺应着日本的消费需求推进的。1965 年日本企业开始投资澳大利亚铁矿，70 年代日本在澳投资快速增长，并于 80 年代到达顶峰，一直到 90 年代初，日本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90 年代后，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导致对外投资减少，但由于其技术优势，其投资存量仅次于英美。

20 世纪 70 年代前，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关系只有日本，且由于冷战的原因，澳大利亚与周边其他国家仍有隔阂。70 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加快了融入亚洲的进程，伴随而来的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整个东亚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与澳大利亚形成了共振与共鸣。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无论在贸易还是投资方面都必须融入亚洲，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发展也突飞猛进。目前澳大利亚前十大贸易伙伴中除了美国，其他九个国家都是亚洲国家。

21 世纪被称为亚太世纪，这个时期影响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最大因素非中国莫属。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变化趋势，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互补性极大显现。中国促进了澳大利亚第二次矿业繁荣，并于 2009 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澳第一大出口市场。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存在很多积极面，但不能忽视亚太世纪给澳大利亚带来的新的困扰，因

为亚太世纪意味着大国博弈在该地区的加剧，澳大利亚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正是由于这种新变化，澳大利亚才首次面临着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其战略盟友的最大竞争对手这样一种困境，由此导致澳中关系出现波折。

澳大利亚一方面根据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亚洲进行交往，另一方面则继续依从于美国。但从美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并不算是令人放心的安全盟友，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它并没有对美国言听计从。从这个角度看，澳大利亚的外交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中美博弈过程中是上升的。在建立印太体系的过程中，除了依从于美国维护美澳同盟，澳大利亚也希望与印度、日本等国家抱团，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因此，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处于长期化和复杂化的阶段，澳大利亚融入亚洲表现出的两面性和摇摆性也会长期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韩锋在发言中认为，西方主导的地区秩序能否接受亚洲地区的发展与合作方式是澳大利亚对亚洲态度变化的前提。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澳大利亚的建国历程。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过程非常特殊，期间它既要求自由独立，又长时间地依赖于西方。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却更多地关注亚洲，这主要源于他们面对的“亚洲威胁”。从最早立国过程中的种族冲突到二战时遭受侵略，以及之后所谓东亚崛起给澳洲带来的边缘化威胁，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亚洲文化和移民的历史。在建国历史渊源及现实威胁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始终坚持西方正统，寻求西方的认同和保护，具有天然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二是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崛起除了经济意义外，更为关

键的是地区认同与合作机制的建立。与澳大利亚比邻的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历史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形成和殖民的过程是相互重叠的，战后强调政治独立和民族独立，此后这一过程被冷战所打断，尽管传统的大国关系可以为这些殖民地国家提供安全保证，但前提是基于大国的国家利益。在冷战进入调整期后，东南亚地区独立复苏，主要特点是以中立的方式寻求地区发展，同时尊重大国的地区利益，即对外要求大国保证地区安全，对内要求成员国冻结与大国的同盟关系。此外，随着日本的复苏，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体系，并由此创造出亚洲奇迹。

三是澳大利亚的历史、政治、文化与地理、经济合作出现“双重心”，需要对此进行平衡。东亚地区一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加工制造业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地区的产业链，其特点是劳动密集型优势突出，但原料与能源相较缺乏，所以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发展的结构，具有天然需求。东亚在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一直是澳大利亚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将这一问题推向了极致。特恩布尔政府明确提出经济结构要多元化，实际上其前任霍华德就已经提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但这对澳大利亚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利益驱动和原材料及能源的出口在地区的需求中是结构性的，如何对双重心进行平衡是一个重要问题。

四是澳大利亚面临的困境。首先，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深入参与到地区合作中后，东亚地区在市场、技术和资金等方面更加完善，逐渐形成世界制造业的基地，在 1997 年和 2008 年两次经济危机中显示出地区结构的韧性。其次，

从传统产业合作升级为传统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并最终形成有东亚地区特色的一体化，中国参与的力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加，超越了日本。第三，东亚合作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式，并且合作范围不断扩大，超越了简单的地区概念。亚洲发展道路越来越远离西方的模式，使得澳大利亚在面对亚洲时产生了困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主导的地区秩序能否接受亚洲的发展和合作方式，是澳大利亚与亚洲开展合作的前提。澳大利亚作为地区合作成员逐渐产生归属感，并对地区有了身份认同，对于区域合作也有信心，对澳大利亚来说已经远不是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但在地区合作中，一些国家仍认为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它对地区的参与和认同度不够，并不完全算是亚洲成员。鉴于此，澳大利亚需要在平衡西方价值观和现有国际和地区体系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找出亚洲地区能够接受又符合澳大利亚身份的关系模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丁斗的发言聚焦身份政治与澳大利亚的亚洲观。他认为，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长期宣传所谓的澳大利亚困境，即澳大利亚处于它依赖美国军事保护和中国商业利益之间的困境，其本质反映了澳大利亚身份政治的焦虑，因此不应过高估计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漂移甚至认同，反之也应看到，澳大利亚将来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特朗普政治行为的民粹主义。

澳大利亚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总体良好，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实现了跨越式繁荣，但近年来澳大利亚经济的后劲越来越不足，制造业出现空洞化，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

传统的农业、矿业以及教育服务业。

澳大利亚经济第一个黄金时期来源于英国，通过与英国的合作提升了自身的产业结构，其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冷却技术运到英国，资金则是通过英国的债券市场借资而来，与英国发展出较好的产业协同关系。战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产业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联系源于全球市场经济的选择，但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澳大利亚在人工智能、超材料、无人驾驶等领域处于完全落后，即便有一些原创技术和想法，也很难转化成为现实技术。

短期看，依从于美国的澳大利亚经济状况较为良好，但从长远看，在世界经济将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其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对于存在于未来的恐惧是清楚的，但如何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紧跟美国，同时在世界产业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选择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非常难。丁斗认为，对于目前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未来增长动力不足的澳大利亚来说，未来或将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到以中国为主的产业链分工中，一旦加入到亚洲发展方式中，其一直以来具有的西方的传统特征也将逐渐变弱甚至消失。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认识源于毛泽东的两个谈话，一是将澳大利亚定义为第二世界，即可以争取的朋友；二是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孤独的大陆”，其政策选择有限。上述两个判断影响了中国对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的看法，即如果能够争取到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但实际上，澳大利亚应该被视为美国的“51州”，在中美竞争中中国应抛弃幻想，指望澳大利亚站在中国一边至少在20年内是不可能的。

事。

丁斗认为，澳大利亚是从其在亚洲的处境角度来讨论亚洲观问题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正处于亚洲化的过程中，其人口构成日益丰富，文化日趋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其以白人为主的群体也有可能因此产生焦虑，从而出现类似于美国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政治。

墨尔本大学教授 Pookong Kee 的发言题目是《从距离的禁锢到近邻的悖论:转变中的澳大利亚—亚洲关系》。

他认为，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地理位置相近，在过去 200 年历史中，澳大利亚与亚洲甚至中国的交往也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 19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华人赴澳淘金潮；20 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二战后澳大利亚废除“白澳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 世纪 80 年代霍克总理和基廷总理时期工党政府对亚洲的重新定位等等。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国内经常出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可能对今天的中澳关系形成“阴影”，但这个“阴影”并不能代表澳大利亚 200 多年的历史，且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只是澳大利亚政党的政治表述。

“The Tyranny of Distance”（距离的禁锢）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 Geoffrey Blainey 于 1966 年写的一本书。该书认为，距离的孤立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国家经验，也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历史、身份认同和未来定位。很多澳大利亚学者认为这个书名是对澳大利亚历史最为深刻的一种表达。除了“The Tyranny of Distance”，对澳大利亚民众来说另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是“The Bulletin”。这本创刊于 1880 年的杂志曾长期使

用“**Australia for the White Man**”（澳大利亚属于白人）的刊头语，直到 1961 年才取消，杂志主要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的认同，以及早期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自豪感，被看作是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石，草根（荒野）民众的圣经。这本杂志实际上也是对一些人持有的“澳大利亚紧抱英国、美国大腿”看法的否定。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政策出现多次变化。1972 年，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废除了“白澳政策”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 年，自由党总理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接受了大量印支难民；1983 年之后的 30 年间，有 4 任工党总理对澳大利亚亚洲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澳大利亚贸易伙伴排行榜前 5 位中，亚洲国家占了 3 名，而在十大外来移民来源地中，亚洲国家也占有 6 席。

尽管如此，目前参与者的多样性导致了澳大利亚对亚洲关系出现“近邻的悖论”。政党方面，每个政党内部都存在左派、右派等内部派系斗争；政府机构方面，外交部等部门偏向于亲亚洲，但安全部、国防部等部门却持更加保守的观点。媒体方面，一些高度集中的商业媒体如默多克传媒一向较为保守，此前比较中立的媒体如 Fairfax 也因经营问题开始对亚洲国家发表狭隘意见。此外，工会、智库、专栏作家、学者、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也都在对亚洲态度上表现复杂。

从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角度看，他们对于不同国家的“感情温度”也不一样。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统计，2017 年澳大利亚人对新西兰的感情温度最高为 85 度，对美国的感情温度为 69 度，在亚洲国家中，对日本

的感情温度是 71 度，中国则是 59 度。在讨论澳大利亚与亚洲、中国的关系时，不应忽视普通民众的感情，同时也能看出他们对美国也并非有特别的认同或亲切感。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张秋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与时代视角下的澳大利亚亚洲观探析》。他认为，澳大利亚亚洲观历史与现实的悖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和新课题，过去 50 年来一直被学术界瞩目并引起争论。近年来由于中国和平崛起、亚太格局的变动和澳中关系的波折，这一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平面到多维的历史演变。他将从种族文化观、地缘政治观及移民问题三个历史视角，对亚洲观的实质、内涵及发展趋势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及其影响下的亚洲政策。

种族文化观是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核心与深层次部分。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即 1788 年以来的白人种族文化观，脱胎于英国传统，来源于英国移民。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澳洲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逐渐受到了亚洲移民潮、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和中国及亚洲其他民族觉醒的冲击，进而对亚洲产生了强烈的忧虑与恐惧感，形成了以“黄祸论”为代表的亚洲观。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白澳”思想及其政策构成了澳洲人亚洲观的核心，直至 1972 年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内阁执政，澳中建交后才得以废除。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澳大利亚亚洲观重新取向的开端，也使“白澳政策”的理论开始得到修正。二战使澳大利亚逐

渐认识到：种族文化上的同源同宗并不能保证国家与安全利益上的完全一致；澳大利亚必须面对人口众多的亚洲这一客观现实，并与之改善关系。战后初期至 60 年代，澳大利亚人亚洲观中的种族色彩虽在淡化，但又被罩上了冷战的阴影，澳大利亚只能在冷战的框架内，与意识形态一致的亚洲国家进行有限的符合共同战略利益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后，随着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动和澳中关系的正常化，澳大利亚加快了走向亚洲的步伐。8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在将其经济贸易方向转向亚洲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改变其原有的种族文化观。1993 年，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这种以“面向”和“融入”为口号的亚洲观，与其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因为澳大利亚与亚洲社会长期存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因种族优越感造成的隔阂，这种不同文明类型价值观之间的摩擦，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澳亚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

地缘政治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人亚洲观和战后亚洲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地缘政治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澳洲人都在担心亚洲的入侵，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都曾被认为是潜在的入侵者。澳大利亚决策者“为了表达澳洲人对其亚洲近邻的担忧，将欧洲人称之为‘远东’的地方改称为‘近东’，它是在接受了欧洲中心的总体思想下，又坚持了澳大利亚的邻近感”；“远北”说则“明确了日本在澳大利亚的北方，但通过认可欧洲的‘远’，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了人们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过分

紧张感”。

澳大利亚这种被动适应地缘政治观，对其战后的亚洲外交战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早期澳大利亚建立了消极的地区防御战略；50年代随着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澳大利亚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对其构成威胁，转而确立前沿防御战略。澳大利亚因地缘政治观的偏差所导致的亚洲战略的失误，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得到调整。高夫·惠特拉姆调整以冷战思维为指导的地缘政治观，确立了“澳洲至少在10年内不会面临严重威胁的观点”，改善对华关系，陆续从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军，结束了将东南亚作为澳大利亚前沿防御阵地的历史，并开始推行积极的以区域和平为中心的亚太合作战略。

第三个视角是移民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澳亚接触，一般认为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华人为主的亚洲移民赴澳淘金热时期。早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通过移民来认识亚洲的，因而移民对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形成和早期澳亚关系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移民政策是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100多年来无论是哪个党执政，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在很长时期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亚洲政策的制定和澳亚关系的正常发展。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对亚洲敞开移民大门，并正式提出多元文化政策，致力于建设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亚洲和亚洲移民，澳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当代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演变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历

史联系，且随时代与亚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崛起和特朗普执政后。首先是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核心与深层次部分——文化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地缘政治观因世界格局和亚太形势变化也在不断调整。最后，移民与华侨华人问题仍在影响澳中、澳亚关系。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现实经济利益、地缘安全因素（如何“在一个缺乏美国强有力存在的亚洲生存”）、国家定位的困惑（如果将 20 世纪 80-90 年代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的基调定位为“面向”和“融入”，那么 21 世纪的基调则为“摇摆”和“选择”。）

张秋生认为，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和亚洲政策体现的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亚澳关系和中澳关系主流仍然是稳定的，共处于亚太命运共同体中的澳中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涉及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冲突，且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和利益需求也决定了中澳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所以，虽然近年来两国交往不断出现波折，但就长远和主流来看，对未来中澳关系的发展可以在谨慎基础上持一定的乐观态度。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汪诗明教授的发言同样聚焦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变迁。他认为，考察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变迁有两个角度：观察视角的变化和亚洲观空间感的变化。前者经历了英国的观察视角、美国的观察视角和澳大利亚自身的观察视角三个阶段，后者则是指受地理空间及其他一些空间的变迁的影响。

首先是以英国的视角观察世界的阶段，这其中涉及多个

原因。从体制上看，1901年联邦建立之后，澳大利亚自然地成为了英帝国的自治领，内部事务自我管理，外交和防务由英国来管理，由此澳大利亚就没有必要在海外建立使馆或驻外机构。从能力上看，澳大利亚没有能力在海外建立外事机构，因为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经费。另外，澳大利亚相信英帝国可以为其安全提供保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澳大利亚在海外是没有驻外机构的，有人建议，澳大利亚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有必要设立海外机构。对此，英国并不反对，但提出条件称，只能设立隶属于英国驻相关国家使馆的参赞，并且其发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公文和信函必须先由英国大使过目。这一阶段澳大利亚观察世界极大地受到了英国的影响。

其后是以美国的视角的观察世界，涉及到澳大利亚由倚赖英国转向美国，以及澳新美同盟的形成。1908年美国大白色舰队访澳，当时澳大利亚做出预判，美国早晚会强大并取代英国。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达尔文港遭到轰炸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过程。柯廷在1942年末新年贺词中表示，澳大利亚要转向美国，这一表态得到了美国的欢迎，但美国并不同意与澳缔结同盟关系，它认为没有义务为太平洋承担防务责任，但澳大利亚则表示，不签订同盟条约就拒绝在安全条约上签字。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整个事件有了转机，澳新美同盟条约得以签订。对澳大利亚来说，与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是其战后外交防御战略的重大胜利。同盟关系的确定使得澳大利亚对外决策在这一阶段受到美国的制约，且没有选择的余地。

再之后是澳大利亚以自身的视角观察世界，这其中有几个推动因素。一是美国与中国建交，却没有事先告知澳大利亚，这被澳大利亚视为对同盟关系的“背叛”。二是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这使澳大利亚受到打击，认为英联邦市场对其失去了吸引力。三是1949年至1972年，工党始终处于在野党地位，经历了长时期在野后执政，工党提出很多新理念，包括惠特拉姆强调的国际主义和独立。上述因素推动澳大利亚开始以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

从空间变化的角度看，汪诗明认为，在英帝国时期，澳大利亚是英国的前哨，亚洲尽管距离很近，但仍被其视为英帝国范围以外的地区。因此，澳大利亚认为亚洲并不重要，不需要对其有所了解，由此形成了一种模糊的空间感。太平洋战争期间，达尔文港遭到轰炸，柯廷总统希望调回在中东作战的军队，遭到丘吉尔的拒绝，澳大利亚第一次感觉到他并不是欧洲的国家，其利益和欧洲的利益也不一致，澳大利亚必须有自己的利益。此后，澳大利亚与美国形成同盟关系，此时其认为亚洲是亚太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才有了较为清晰的亚洲概念，并开始转向亚洲、面向亚洲、融入亚洲。这一过程是收到其地缘战略、经贸利益、国家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的。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副教授孔涛的发言题目是《澳大利亚的亚洲观：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的视角》。她从政治，经济，移民，发展援助，教育和区域合作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澳大利亚与印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并籍此对澳大利亚的亚洲观窥见一斑。

印尼独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于 1945 年实现国家独立。印尼被称为千岛之国，幅员辽阔，人口位居世界第四，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是 G20 成员，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被广泛预测将于 2030 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尼与澳大利亚的接触最早源于两国的原住民和岛民的交往，双方的正式交往依据印尼国内政治的变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 年至 1966 年，从其独立到苏加诺下台，当时印尼的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政治上也不稳定。1966 年之后，印尼经历了起飞的 30 年，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各领域得到发展。1999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印尼经济、政治再次垮塌，此后又出现了断崖式的民主制和分权制以及经济的慢慢复苏。此外，东帝汶的独立也给双方关系带来了重大影响。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印尼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间在自贸方面有很多协议，印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每年约有 100 万人前往印尼，大部分是去巴厘岛。澳大利亚给予印尼非常多的援助，2015 年之前每年约 6 亿澳元，这些援助将投入到印尼国内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每年印尼有好几百学生前往澳大利亚读硕士加博士的课程，很多在印尼国内从事中高层管理的人员都有澳洲教育背景，由此也对印尼对外关系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影响。

出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研究印尼的专家很多，研究的领域也很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澳大利亚对印尼的了解在某些方面会超过印尼对自己的了解。正是有了广泛的交往基础，双方关系能够经得起一些波动，在遇到问

题时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并能在更深层次上建立信任与合作。比如澳大利亚贩毒者在印尼被处决，两国关系紧张，但并不会动摇双方关系的根基。也就是说，通过互动研究及人员往来，双方会形成一种共识或找到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了解对方，建立信任，降低怀疑，推动合作，形成更加平衡的国家间关系，而并非仅仅是单纯地建立在一时的利益基础上的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董汀以海底光缆为例，对中澳关系中的技术因素影响进行了分析。2018年，华为与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签订了铺设海底电缆项目协议，但遭到澳大利亚的质疑，称该项目关系澳方的国家安全，拒绝颁发登陆许可。此后，该项目由澳大利亚接手。部分鉴于彼时中澳两国政治关系紧张，这一事件多被解读为澳大利亚反华的又一举动并画上句号。

澳大利亚为什么能依凭这个模糊且宽泛的“国家安全”之由成功阻拦中国公司与外国政府的光缆项目？这一理由本身又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合理性？澳大利亚的关切是否有因可循？中澳今后在海底光缆领域的合作该如何推进？

海底光缆被认为是承担90%以上全球跨国信息流量的重要基础设施。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带宽需求的增长，2018年新增海缆重现了历史的峰值。海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非常重要，由于很难使用陆上光缆，澳大利亚国内、国际流量几乎全部都要依靠海缆传输，但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限制，其很难建立跨大西洋或跨北太平洋的海缆。对海缆的高度依赖对澳国内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有分析称断网一天会造成 15

亿澳元的损失。

独特的地理格局加之处于海缆高速发展的机遇期，使澳大利亚忧心忡忡。历史上看，1866年跨大西洋海缆首次建成后，英国开始在全球布缆，范围几乎涵盖其所有殖民地国家，唯独没有跨太平洋海缆。澳大利亚当时提出，能否建立一条跨太平洋海缆，至少与加拿大连接，以免被隔绝在整个通讯网络之外。然而，跨太平洋海缆前后耗费20年才建成，这也影响了澳大利亚很长时期的发展。

澳大利亚对推动海缆安全议题的多边化持积极态度。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ICPC）最初是一个类似于产业联盟的组织，2000年起向各国政府开放了会员资格的申请，但直到现在除了创始国英国外只有澳大利亚一家加入。APEC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推动海缆安全的议题，这背后其实都是澳大利亚的动议。澳大利亚国内对海缆法律的归置也是全球最完善的，有三重法律保护，其中对于水路线路规划设立了保护区进行保护，对于陆上登陆点设立了严格的审查流程。

如果抛开技术因素看，中国和澳大利亚很难在海缆领域开展合作，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只有亚欧3号一条海缆在连接，但这条缆的一大特点就是损坏的频率非常高，且一坏就是好几个月。并且，这条缆要在印尼中转，印尼又是海啸多发国家。可以说该海缆的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澳大利亚和中国实际上是有直连的可能性的。此外，澳大利亚自身的跨国海缆布局并不是很合理，其所有出海口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方向，缆线集中于悉尼登陆，尚没有跨印度洋的海缆，一旦该海域出现问题，所有海

缆面临停摆风险。目前澳大利亚唯一的问题就是技术不能完全自给，而中国虽然有技术，但与海缆相关的规则制度有待完善，政府对与海缆相关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度也有待提高。因此，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来说，在了解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基础上，如果再对技术这一完整的生态系统有所了解，可能会有利于经营双方的合作与双边关系。

讨论环节，与会者就上述发言内容发表各自观点。

张智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上议员）：澳大利亚的确担心国际秩序的改变，因为中国是近代以来第一个非西方文化、非英语国家，所以中国强大了究竟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怎样的冲击，工党自由党都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中澳关系应放到中美澳三角关系中甚至是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中看，目前中澳关系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很多都是受美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之所以在中澳关系中表现得如此激进，是担心美国在亚洲撤退，从而不再保障其安全，同样是出于对美国撤出亚洲的担心，澳大利亚召集日本、韩国推动构建印太战略。从现阶段看，澳大利亚保守势力是绝不愿看到澳大利亚政府在任何方面放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师小芹：从军事角度看，澳大利亚对中国担心比较小，但如果有一天美国撤出亚太地区，这种担心就会很高，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会撤出亚太地区，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与中国的竞争将持续很长时间，而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美国定义为门户国家，特别是在印太战区建立后，澳大利亚更是处于中心位置，美国不会放弃澳大利亚。

胡壮麟：澳大利亚并不是担心美国在军事上不对其安全

进行保护，而是考虑美国对它管的太多，不让其与中国做生意。澳大利亚清楚无法改变中国的政策，因此只能期待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改变。此外，缺乏劳动力的澳大利亚要继续发展经济，就需要大量的聘用华人，很多高精尖技术产业中都能看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因此近两年澳大利亚已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其前任总理特恩布尔 2018 年在描述与中国关系时曾提出 **frienemy**（既是朋友也是敌人）的概念。

汪诗明：关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其实澳大利亚的外交对象国是很少的，与很多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包括与印度的关系很长一段时期也是较为稀松的。澳大利亚的外交关系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其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是成为地区强国，从而与中国打交道。而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澳大利亚如不紧跟美国，是不可能成为地区强国的。另外在中澳关系问题上，不能忽视媒体的作用。每当中澳关系出现僵局时，澳方领导人总是会说这都是澳媒体惹的祸，因此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对于这些问题要有严肃的态度。

PookoogKee：各位学者对澳大利亚的一些言论多少带了一点紧张化的性质，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除了政党之间不同的政策外，政党的领袖也有很大的不同。政府的领袖、政党的立场与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可能不一定存在共识。如果查看近年来澳大利亚专业机构的民意调查，可以发现澳大利亚人认为最亲近的国家是新西兰而不是美国，美国的排名甚至没有澳大利亚人对日本的感情度排名高，而中国的排名是很高的，比印度尼西亚还高。所以我们在探讨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社会时，应该看到澳大利亚是非常多元化的社会，而不应局

限于从某一个角度得到的观察。

汪诗明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今天能够邀请到众多澳大利亚研究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是一件幸事。目前国内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人数很多，相关研究课题也很多，学术影响力逐步提升。今天的讨论非常紧凑，各位发言也很精彩，并且内容基本没有雷同，这说明此次工作坊的选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各位在澳大利亚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也希望国内澳大利亚研究的圈子越来越大，为中澳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